

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构的内在机理与优势

魏建克

【摘要】制度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从制度逻辑视角来看,“中国之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动态表达,蕴含着人类现代制度文明的中国智慧,释放着人类治理理念的中国方案。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善、巩固与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科学、信仰和价值三位一体的制度建构,其制度创新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体现着明显的内生性特征。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实现了制度资源向制度合力、制度合力向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向治理效能的成功转化,有着当今世界特定社会形态的一般性规律呈现,其制度机理和效能体现的制度优势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基点和人类高点。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机理;制度效能

【作者简介】魏建克(1975-),男,河南南阳人,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江西赣州341000)。

【原文出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23~3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内涵研究”(1SZ212029)。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9]}。正是从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基于天下视野,在实践中解答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难题,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具有中国特质的“中国之治”。新时代的“中国之治”不只是“中国之制”的结果,它有着一套能够适应并引领时代发展的思想体系、价值理念、制度机制和生活习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国理政,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力量

和现实表现。“中国之治”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理念和实践之中,既有胸怀天下的治理品质,又有内在的中国机理,形成了具有大国之治、政党之治、人民之治、制度之治等民族方案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落脚到制度层面,“中国之治”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动态表达,体现着制度治国、治党和治理天下的中国实践,汇聚并释放着人类现代制度文明的中国智慧和发展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表达,是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制度方案,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它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是深得人民拥护的中国国家制度,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基。目前,学界已逐步超越西方制度研究范式,从历史、现实、制度结构、制度功能等多维度多视角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人类意义。但从制度逻辑^{[2]24-56}的视角来看,文化传统、道路选择、行为方式和制度的内生系统等都是一个国家制度创新的重要变量。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构有着内在的发生机理,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中国制度体系所蕴含的生命力。

本文基于“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制度建设问题的学理性分析,从制度科学性、制度价值、制度信仰上考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灵魂、立场和制度创新的锁钥,可以较清晰地看出,制度在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团结上的显著优势,焕发着制度的生命力,推进制度不断接近其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终极价值目标,进而实现人类共同意志和价值追求,最大化地释放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效能和人类贡献。与此同时,从制度根源、制度优势上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之间的相互统一,进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具有内生性的文化和社会根源。也正是这个内生性的文化和社会根源,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了新时代的制度优势,更好地体现出中华民族本色和人类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科学、信仰和价值相结合的制度建构

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3]12}。立足中国,放大学术的世界视野和历史视域,不难发现,学界对中国式现代

化探索和制度安排的解读逻辑表现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比较苏联范式,以突破苏联模式作为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逻辑;第二类是比较西方范式,以西方现代化逻辑来审视和评判中国式现代化和制度建设的经验;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范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制度完善的逻辑;第四类是中国中心观范式,把中国现代化经验作为中国制度的逻辑,探索中国制度的内源性动力。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制度安排的四种逻辑解读并不是完全隔离,而是相互萦绕,由于学术立场的差异,具体运用上则各有侧重。实际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价值和制度安排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基于“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提升“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4]22-27},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制度设计实现了对传统的持续汲取、突破与转换,成就了“中国之治”的制度运行机制和价值选择,彰显了中国制度的本色和世界意义。

对传统的汲取、突破与转换,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和制度的科学性逻辑、信仰逻辑和价值逻辑。制度科学性逻辑的核心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制度安排有没有实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脉相承。信仰逻辑就是如何实现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它是一种精神反思,是对制度科学性的再反思,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5]9},逐步形成了有系统的制度理论总结,最终成为执政党的思想体系,成为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价值逻辑(文化逻辑)是信仰逻辑的社会群体外延,源于历史的沉淀,是传统的现代反映。它的核心是民族精神或民族灵魂,包括当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需求。当然,对中国传统的汲取、突破与转换离不开历史意识和历史认知,即在完善和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让更多国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这正是中国中心观的客观表达,表现出“回到中国”的中国方法和人类终极目标追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构的实践上,不但要汲取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和品质,而且要突破,“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498}。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潮流之一,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受其影响至深,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新内涵,成为国际共运持续前行的根基,这本身就是汲取与突破。五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运动,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维度、空间维度和实践维度继承和突破国际共运的传统品质,如加强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广泛的统一战线、密切联系群众等系列品质的承继从未停滞。中国式现代化把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力促其时代转化与飞跃,释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生机活力。从继承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守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其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中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确保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经验总结中坚持“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相统一,确保共产主义原则不丢失。三是坚持实践标准,坚定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不是

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突破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7]78}。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8]7-8}。

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制度实践,实现了对传统的转换和突破,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对此,邓小平从人民立场出发,早就给出了经典回答。他说,“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9]1364},“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10]207}。按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根本上就是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接受。认同和接受度越高,科学性自然越强。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践,这个实践从传承中华文明的精华中走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创新中走来,为世界现代化开辟出新路径,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提供新选择。就制度实践而言,无论是独特的制度优势,还是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抑或制度的有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过程就是弃旧图新、与时俱进、不断超越的开放过程。这一过程呈现出方向与原则意义上的‘路径’依赖与创新、整体演进与有序展开、顶层设计和基层推动、实践基点和以人民为中心、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11]13}。所有这些都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和现实的科学真理性。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信仰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出时代信仰。执政党的理论信仰同样表现着对传统的汲取、转换和突破。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2]80}。正是这个精神信仰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必然要从实践经验中凝练说服人的理论,这就有了探索的方向和行动指南,也就有了精神信仰的中国逻辑。

精神信仰是“在人类所有信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决定作用、有着本源价值、发挥原动力作用的基础信仰体系”^{[13]43}。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而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滋润下的精神信仰具有理论根基地位,能够激发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自信心。精神信仰作为现实物质存在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样表现出执政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理论自觉,体现出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上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行动自觉。这种信仰总是能够深入内心,融入血液。这个信仰逻辑不是来源于某个原则,而是来源于人民,来源于实践,其逻辑关键词就是人民和实践。尽管有学者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信念,而非信仰,视为一种中国人信念的填补剂,填补了近代以来一度缺失的“道德空白的世俗信念和历史信念”^{[14]38};但是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安排,不但从现实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再提升,而且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当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这个信仰的结晶,或者说现实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它的行动指南就是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日臻成熟,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和信念,也体现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15]。这

会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甚至会扼杀党的信仰逻辑。这种认识来自现实探索中执政党对面临的风险和考验的反思。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进程来看,尽管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期待远没有彼岸虚幻精神慰藉更容易发生,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者的精神信仰,已经且正发生着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转型。这个信仰具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实经验而可及的,一个是未来可知而未达的。现实经验而可及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未来可知而未达的是共产主义信仰。要形成这个信仰体系,就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寻找中国方案,释放中国智慧,汇聚中国力量,凝练中国经验;另一方面要坚定追求梦想,探索共产党人治国理政规律。毕竟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成就了中国革命,成就了新中国,成就了改革开放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是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追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使人们产生敬畏、形成信任、激发责任,真正化解人们面对的生存和生活难题,促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是掩盖矛盾,欺骗和麻醉,期待彼岸的虚妄和无知。正是这个精神信仰,中国共产党清晰定位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个宏伟蓝图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转化为现实路线图,成为信仰逻辑的现实奋斗表现,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中心观立场。

(三)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我们除了不能贬低任何通用的价值之外,还要去尊重任何民族所选择的现代化和制度安排的价值。任何一种现代化选择都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自然需要创造和提炼属于自己的文化底色,这个底色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

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16]当代中国的精神信仰拥有自己的文化(价值)逻辑,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科技创造、文艺作品,建筑工程、思想成果都彰显着民族的价值取向。文化(价值)逻辑作为信仰的社会外延,其目的就是要凝聚人心,唤起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和特殊品质。正因为信仰逻辑的关键词是人民和实践,需要从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和团结精神中去塑造文化价值。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和制度安排所表现出中国之治的文化价值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这个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内含着正在创造的时代新文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制度完善的进程中,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已经标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价值。实际上,文化就是制度的深层次价值,也就是说,“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价值,创造文化就是要创造价值,这就有了价值导向,共同的价值取向问题”^[17]。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所凝练的新文化价值体系,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的文化掌握了思想主动,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实现从人民中来的精神升华和到人民中去的精神引领,从而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由此坚定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可见,中国之治的文化价值之二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当前,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价值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主题,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文化是最大的经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国内学者提出的“文化政治”“文明

互鉴”等理论成果已经充分表明,文化所承载的经济、政治、社会价值显而易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在民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拓展现代化途径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清晰的价值指向。这个价值不是一种主观意念,或是某个作家和智者的创造。它根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存在,其制高点就是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文化信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价值不断受到挑战,各类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辞、“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声音总是不绝于耳,文化价值冲突下各国家的制度模式选择仍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愈来愈受到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并且有效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诸如党的治国理政的制度安排、大国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民族复兴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传递都属于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脱颖而出,从价值层面开辟从中国之治迈向世界之治。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使中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跳出西方中心观来审视中国,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新理解。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逻辑,是要通过文化价值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科学性和世界性。一方面通过民族文化价值消除西方“普世价值”对中国制度的政治附加值,防止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注脚;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制度在当今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彰显中国之治在解决人类问题上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进行去蔽与唤醒,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支配,激活中国精神的价值资源,接

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整的价值链条,保持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史价值的连续性。这样,中国之治所伸张的文化价值不仅能给国人以“回家了”的感觉^{[18]90-91},让大家感受新的文化上的创造所得到的真实利益,而且有利于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开阔之地,受到各国家的认可与传播。

二、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造源自内生性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从内源性动力上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创造,需要深入中国改革发展考量,深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窥察,深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中审视。也就是说,一是要从近代中国政治道路的历史选择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二是要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治国理政尝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析其历史逻辑;三是要从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中解答其实践逻辑。

当然,全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及创造的中国制度,还需要“以‘世界进程’为坐标,以‘长时段’为量度,在比较中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中国历史传承的积极基因及基因缺陷,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制度设计的历史底蕴中包含的普遍价值、独特功能及其历史限度”^[19]。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肯定与理性反思,也是对西方文明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现代化的理性反思与界定。基于此,理解“中国之治”就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确立什么样的理念,应具有什么样的视野,以及应秉持什么样的态度”^{[20]3}。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安排要内在体现中国人民的价值及其世界和人类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有着突出的“内生性演化”特征,其理论逻辑体现民族文化

特质和典型的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局部治国理政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党内巡视制度,以及延安时期的一元化领导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等等,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中国实践。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21]447}。“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现实化是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22]69}。在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逐步确立了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首部宪法,逐步确立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了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为成功过渡并建立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制度的发展完善,观念的改变、矛盾的解决、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人民的期待,无论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是世界级的贡献、全人类命题。正是探索着这个适合自己实际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治作用更加彰显,从经济转型到经济复兴,再到政治改革、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生态关注和党建创新,有了系统的制度理论总结,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总体布局。这个探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这个发展是民族的、国家的,又是社会的、利民的、世界的。这个制度理论的创新不是起始于西方逻辑,而是发展于中国经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程中

逐步彰显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把握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正是基于理论逻辑同历史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能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可以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如果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逻辑严重背离,就需要修正乃至抛弃那种理论”^[23]。因此,用西方制度逻辑来诠释中国制度,必将走向认同中国制度的死胡同,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一定用错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主动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经历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再到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历史进程。首先,制度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巩固、完善与发展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反映制度与具体历史过程的交融而铸就的历史机制,成为“中国之治”历史逻辑的出发点。翻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夺取政权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体现中国政治道路和政治实践同西方制度生成过程的根本差异。其次,制度的统合性和辩证性是理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而这正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过程中,集中与民主的互动交融,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相互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政治生活中“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六又”局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

体现的不但是制度发展的辩证法,还有着看似矛盾却能在制度实践中实现制度统合的发展性特质。

紧扣时代要求,把握历史主动推动制度创新,客观的表现是继承和发展已有的历史传统,遵循内在的历史规律;主观上是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人类社会的一元多线的制度探索中找到相对时空的绝对制度真理,从而把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制度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显得日趋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布局 and 战略安排更加彰显国情现实和自身文化特质。何显明曾给出清晰判断,他从国家意志聚合与实现的视角认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制度有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动员型社会、新型举国体制”^[24]₂₆₋₄₅等国情根源和文化优势。人们从历史进程中思考制度逻辑,新时代中国已迈进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新起点。这个历史新起点不仅要实现制度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赢得当下人类社会的制度优势和绝对真理价值,而且要更加贴近中国现实和自身发展,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以更高要求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新时代制度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着客观实践的辩证法则,体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规律和内在本质的积极探索。正如列宁所讲,“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25]₁₃₂。从党的十二大开启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正创新,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孕育与发展,到党的

十七大逐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再到党的十八大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6][23]},开创了“中国之治”的新高度。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27][272]}。

实际上,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之战略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总目标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权威。制度权威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实践所开创的人类制度辉煌体现出全人类的“中国逻辑”。这个中国逻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始终立足于国情,植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制度守正创新的实践逻辑、辩证法和主观能动性,反映了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客观物质过程,实现了概念和内涵、形式和内容、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性、人民性、实践性、传承性和权威性特征。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体现着中华民族本色和人类价值

新时代,中国更需要用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通过国际的对话实现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28],这实际提出了“回到中国”这

一命题。“回到中国”不但是中国学界学术自觉的反映,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成长的结果,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使然。与西方中心主义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范式不同,“回到中国”就是要把“中国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社会的简单克隆,而是具有丰富的中国经验、明显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延续性、内在的历史动力与制度活力的中国逻辑和治国理政方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和自身特色相互促进的中国实践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体现出动态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制度“图谱”的完善和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革命年代,针对中国采取何种民主制度,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29][36]}。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30][4]}。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上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既保证了制度的发展方向,又为制度创新留足了空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才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制度改革创新,“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27]}。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效能源自实践中的制度资源和制度理论

党的制度资源的创造既有对近代国人探索失败教训的反思,也有对自身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建立何种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复尝试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历经了从技术层

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31]。这些失败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制度体系指明了方向。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委员会制度、三三制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法律制度、巡视制度、监督制度、财政审计制度等等,积累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初形态。1941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32]。194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以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论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正是这些革命实践中的制度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优势基础。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有形成果。制度是现代化探索的结晶和有形的理论成果,有着具体的时空真理,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探索都不可能靠照抄照搬这些有形的理论成果,都需要充分结合自身实际和文化根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形成属于自己有形的制度产品,而且这个制度产品是能得到广大人民拥护,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这个制度产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它涵盖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多个层面共十三个领域和方面。上层建筑

层面,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行政体制;经济层面,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文化文明层面,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民生层面,有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环境层面,有生态文明制度;国家安全层面,有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祖国统一层面,有“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大国外交层面,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监督层面,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从严治党层面,有“四自能力”制度规范体系。这些制度相互作用,产生化学反应,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合力,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效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这个生机活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在实践上的集中呈现。“制度图谱”深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譬如党的建设的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理论、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理论。除此之外,一些诸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理念、政策也成为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不断走向成熟。成熟的制度理论,对外可以为制度竞争提供学理支撑,对内则可以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并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从人民立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占据了人类制度理论的最高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一般规定性,彰显了制度理论的民族特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从而焕发出新时代的中国活力和世界生机。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效能体现出人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安排是扎根中国土壤、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制度成果,诸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完善的分配制度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这些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效融合,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到重要制度,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改革创新,根本性方向性的制度设计体现着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创新性活力性的体制机制安排展现着制度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一方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体现出制度建设的现代性,呈现出制度的世界化进程。制度本质规定性和现代性的有效结合,确保了制度利益和制度价值的有机统一,既有助于提升治理能力的最大化,又能确保制度价值不变色。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中国土壤而又面向人类价值追求的大气魄和大视野,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逻辑和大趋势,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彰显治理体系的现代文明品格,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有了治国理政的现代化表现和世界气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治理能力强不强关键是执行力。正是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实现制度指引方向上更加精准,

制度规范行为上更加有力,制度执行监督更为严格,形成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下的多元合力,从而增强了治理能力,统筹推进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治理能力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体现的是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善治理论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是善治理论的实践表达。善治理论指导下的“善治模式能够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治理效能的最优化,因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向”^{[34][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形成了体系和功能的统一,党领导人民带头维护制度权威,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并发挥出制度治国理政的能力。也就是说,制度执行能力的强弱、制度执行效果的高低,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所具有的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新形态。”^[35]制度优势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体现国家之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密码”充分体现着“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制度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借鉴国外优秀制度文明成果,挖掘中国传统的优良制度资源,把制度资源转化为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使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激发社会的创新创造生机,最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汇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结语

从制度建构、内源和效能整体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更好地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和制度设计的时代魅力。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走完了制度

建设的前半程,“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5]104-105}。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并不是要走向固化或完全定型,它仍需要在发展中推进制度的创新和日臻完善,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上做文章,在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治理效能方面永葆开放性。

实际上,在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机制、内源和效能的基础上,我们仍需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3-24},从中国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需要从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和当前人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譬如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上来强化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的执行。我们甚至更加需要科学分析和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灵魂”、人类“立场”和人民“价值”之所在,这依旧是制度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继续深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桑顿,奥卡西奥,龙思博.制度逻辑:制度如何塑造人和

组织[M].汪少卿,杜运周,瞿慎雷,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3]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4]孙正聿.当代中国哲学观念的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6(1).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贾绘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基本特征[J].探索,2016(1).

[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3]戴建忠.精神信仰的逻辑图式及政治相关性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4(5).

[14]邓晓芒.信仰三题:概念、历史和现实[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4).

[15]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EB/OL].(2016-11-02)[2022-09-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2/c_1119838382.htm.

[16]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1(2).

[17]冯契.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探索与争鸣,2015(11).

[18]王培洲.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道路的文化价值[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4).

[19]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6(7).

[20]叶险明.“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一种基于对当下“中国语境”反思的批判[J].哲学研究,2015(10).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2]平飞.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化的中国经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

[23]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起点[J].政治学研究,2017(1).

[24]何显明.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及其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意志聚合与实现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2(9).

[25]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8]杨光斌.“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学科性贡

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B2).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0]习近平.在红军长征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1]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求是,2019(23).

[3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07-28(1).

[34]肖巍,顾钰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5]尚伟.中国式现代化及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涵和世界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3).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Advantage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i Jianke

Abstract: Institutions play a fundamental, overall and long-term role in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s a dynamic expression of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tains the Chinese wisdom of human modern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and conveys the Chinese approach of human governance philosophy. Understanding the establishment, improvement,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can fin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a trinity of science, faith and value, and it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mbodies obvious endogenous characteristics in its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realized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o institutional joint forces, of the institutional joint forces to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of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hich displays the general law of world's specific social form at pres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embodied in it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efficiency, highlight the national base and human heigh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